

南湖革命纪念馆中记载的 临夏籍民族英雄——马福祿

本报记者 马廉朴



南湖革命纪念馆是浙江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议的宣传、保护、管理机构，成立于1959年10月，建馆之初，馆址设在湖心岛。2020年，该馆入选“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今年6月5日，经过展陈的全面改版提升后，纪念馆恢复对外开放。主题展《红船起航》全面阐释了一个大党与一条小船的关系。据悉，改版提升后的展陈面积共5600平方米，设置文物资料1134件。主题展由“救亡图存”“开天辟地”“光辉历程”“走向复兴”4个部分、21个单元组成，并设“中共一大代表人生轨迹”“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历程”两个专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当时，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到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议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习近平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成为9800万名党员的历史。



这个神圣的地方，在主题展“救亡图存”版块中，有一块“历史反抗外国侵略著名清军将领一览表”版面，上面记载着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00年反抗八国联军入侵中为国捐躯的12位民族英雄，并简要介绍了他们的事迹。临夏籍爱国名将马福祿名列其中。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位彪炳史册的临夏籍民族英雄。

考取武进士 组织乡勇保家卫国

1900年，华北地区掀起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垂涎已久的西方列强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借口保护侨民，悍然组织联军入侵我国。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临夏籍爱国名将马福祿浴血捐躯北京正阳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爱国壮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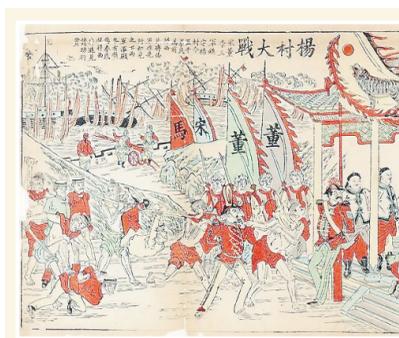
马福祿(1854—1900)，字寿山，回族，临夏县韩集阳洼山人，清同治年间西北反清起义军首领之一的马千龄次子，幼年师从康泰，读四书五经。马福祿体格魁伟，力大过人。对马福祿少年英武，《清封振威将军日记总兵甘军简练马步各营统额马公行状》中是这样记载的：“一日，牧童驰报曰：‘狼入羊群’，公辄负枪怒马逐，狼见人来，缩腔取力，尾拂地颯颯作响，公发立直视，俄而，狼忽起为狮子舞，公见前后左右无非狼也，下马发枪，中其腰，狼负创逃，血滴滴过山后，马逸还松坪，公急趋视，见公持枪立血泊中，询所遇，公告之故。同蹊迹追之，不一里及狼，狼创甚不得通，回头反扑，公既与父偕，胆益壮，复发枪砰然，狼又伤，生缚以归，年甫十一，壮哉弗可及已。”“公材力与年俱长，虎背熊腰，面作铁色，目光如岩下电，口汨汨如悬河，所持艺无不精，众逾异之。”

及长，他弃文就武，投师于靖远大芦棚门下学习弓箭刀剑之术，以善骑射闻名。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第一，次年中武举。光绪六年(1880)，赴京会试，考中头名，但因殿试时用力过猛，连折三张弓，光绪帝认为他太粗野，且在上殿拜见皇帝时不熟悉礼节，被降为进士，始留京任御前侍卫，后为河南镇标，不久以亲老乞养为由，辞归故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循化发生宗教纠纷，由于清廷官员处置失至于偏，遂激起河湟回民起义。镇台汤彦和被害义军打得溃不成军，退守临夏双城时，再遭阻击，至全军覆没。马福祿兄弟率残部拼死保汤彦和退甘南绕道进省城，得总督杨昌浚嘉许。起义军以马福祿兄弟“助官军”，烧其“阳洼山住宅，以及亲族庐舍荡然无存”。彼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大部分清军已东移，驻军不多，清廷便令甘肃回绅招兵防卫，马福祿与弟马福祥组织乡勇团练，名“安宁军”，分步、骑两营，马福祿为督带兼步兵营管带，马福祥为骑兵营管带，同归河州镇节制。河湟事变后，安宁军被编入董福祥统领的简练军，马福祿擢升为总兵。

血战正阳门 抗击联军以身殉国

光绪二十二年(1896)，马福祿兄弟被清廷调往京城，负责驻守北京外围的河北正定、廊坊一带。光绪二十四年，马福祿率部随董福祥进京，后赴直隶，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及薊州。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从大沽登陆，进犯天津、北京各地，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史称“庚子之役”。马福祿率甘军英勇还击，开始了北京保卫战。5月10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率侵略军2000余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沿途因受义和团阻击，4天只推进了130华里，于14日到达廊坊。马福祿受董福祥之命，率领以家乡子弟为主的骑、步七营兵，赶到廊坊，同义和团一起，向侵略者发起猛烈攻击。马福祿令“步兵张两翼，敌进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清史稿·马福祿传》)。激战中马福祿、马福祥身先士卒，“挥短兵闯人阵，喋血相搏，敌不能支，乘火轮(注：火车)而逸”(王树楠撰《振威将军神道碑铭》)。西摩尔逃回天津后仍惊魂未定，心有不甘地说：“如果中国军队武器都是现代枪炮，那么我所率领的联军定会全军覆灭。”《清史》称廊坊之战是对外之役“第一恶战”。



庚子(1900)年的战争时事宣传画《杨村大战》

廊坊之战，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一次著名战役。马福祿率领的临夏子弟，冒着敌人炮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戳穿了帝国主义吹嘘的“西方军队无敌”的神话，为保卫祖国立下了战功，大长中国人民志气。

军借口保护中国领事馆，于7月初，集结2万重兵，向北京发动进攻。马福祿奉命坚守正阳门(前门)。战前，马福祿对弟弟马福祥说：“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报国，为民族争光。”因此，当侵略者逼近，清军骑兵、神机营、虎神营等纷纷败逃时，唯有马福祿率领的甘军和其他爱国官兵与侵略军展开了生死决战。后东便门、东直门、朝阳门相继落入敌军之手后，马福祿仍然坚守正阳门，孤军奋战，一步也不后退。侵略军集中炮火向正阳门城楼轰击，原有4层的箭楼被削去了两层，然后步、骑兵轮番冲锋，最终攻陷了正阳门。

6月20日—25日，是董福祥所率甘军围攻使馆最激烈的日子，也是马福祿所率简练军死伤最多、最残酷的一位。据《义和团史料》记载：“简练军死伤千数百人，战将两名，营官三名，哨官十余名，悉尽于此役。在激战中，当一些甘军受伤已仆在地时，口中仍呼杀不已，有一人已倒地，还尽力掷出手中的刀，砍在敌人腿上。”这些细节记载显示了甘军将士善战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马福祿召集余部，进行了一番整编，和他们一起宣誓：“不夺回城楼决不罢休。”他挥舞着战刀带领士兵勇猛地发起反攻。八国联军攻占正阳门后，在城楼上设置了10道栅栏，阻挡清军反攻。马福祿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登上城楼，冲破敌军的第一道栅栏。马福祿继续前进，勇猛地突破第

二道栅栏。他们跟敌人激战了一昼夜，又一连攻破了7道栅栏，杀得敌人尸体狼藉，血染红了城墙。只剩下最后一道栅栏，眼看就可以把敌人打出正阳门城楼了。这时，夜幕笼罩下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马福祿带着士兵冒雨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大声呼喊着冲向最后一道栅栏。突然，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口中，他当场为国捐躯。

后人用这样的诗句赞颂他：“光争日月气如虹，独立提师战八凶。一马巍然忠烈中，千年遗恨泣英雄。”在这次战役中，同时战死的有他的弟弟马福恒、马福宣、马福全、马福贵，堂侄马福图、马兆图以及临夏籍官兵百余人。马福祿以身殉国时年仅48岁，被清廷封为“振威将军”，谥号忠烈。

关于民族英雄马福祿，还有一个记载：1946年初夏，其子马鸿宾去重庆开完会，顺便搭乘李宗仁的专机取道北京，从一位故交处，取回马福祿的遗物。还有一件从天津亲戚家带来的马鸿宾祖母的衣服，之后准备乘飞机返回宁夏，进机场时工作人员没有阻拦两个随从，即将马鸿宾鞋在门口，就因为其身穿粗布长衫和自家做的布鞋，戴一顶普通的礼帽。经过随从解释，工作人员才同意放行，但箱子必须检查，无奈之下，马鸿宾打开箱子，瞬间人们惊呆了。一件浸满血迹的清朝武官服，一件像麻袋片缝制的补丁摺补丁的大襟上衣，还有几本书和文件，别无他物。大家愣神之际，李宗仁得知情况后赶到机场。马鸿宾说，浸满血迹的衣服是他父亲在正阳门抗敌阵亡时穿的战服，另一件是祖母留下下来的衣服，带回去让后人看看，不要忘记，培养心田，时存济贫之心，记住国耻，励志勇锐，不忘报国之志。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李宗仁立即向马福祿衣冠立正敬礼。

马福祿遗身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三里河。20世纪5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其子马鸿宾将他父亲和其他爱国英烈们的忠骨迁往故乡安葬，在韩集阳洼山建立马福祿神道碑(“文革”中被毁坏)。1996年4月，临夏州委、州政府将马福祿墓地列为州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马绍常(1902—1966)，原名马效融，回族，甘肃省广河县城关镇人。他少年时曾就读于兰州一中，1925年毕业于西北军的甘肃省军官教导团；1926年在西宁县守使马麒部下任副官；1927年在武威西北军骑兵第八旅任营长；1930年到1933年之间，先后任陇南马廷贤部驻西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孙蔚如部第十七师参议及甘肃省环县县长等职；1934年至1935年间，在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任参议；1936年9月，在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参加革命工作。

发起组织回教救亡联合会

1935年，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头，国民党对外执行投降政策，对内加紧镇压。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不久，西安回教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在12月17日的《西京日报》上向全国回教人民发出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教同胞予以响应，同时督促白崇禧、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希望派人来西安参加救亡活动。

紧接着来自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教代表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教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吴鸿宾、马绍常、马德涵、马宪民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其宗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张、杨二将军的义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期间专门接见了该会负责人，并对该会给予了很高评价。

东奔西走营救流落西路军

马绍常与甘肃马家军阀有一定交情，在安排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与马麟会面、营救西路军方面慨然出力。

据受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委托，到甘肃营救被困在河西的西路军营救团三名成员之一的马宪民回忆：“当时，吴鸿宾(回族，甘肃平凉人，系中共早期党员，建国后曾任兰州市市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以‘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的名义负责召集了西安市回教知名人士座谈会，参加的有马德涵、韩勋杰、丁子勋、马品章、马述尧、谷梦安等。”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政治主张。会后，向全国回教人民发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教同胞予以响应。同时，另致电白崇禧、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促其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当时只有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响应呼吁，派代表毛耀庭携电文来西安联系。”

1937年1月，马绍常来西安给马麟的亲随介绍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秘书张文彬，会面地点在一个旅社。马绍常介绍吴鸿宾和马宪民是“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的人。张文彬向吴鸿宾等询问了回教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展情况，他们一一作了汇报和说明。张文彬表示支持联合会的爱国主义行动，并约定经常与他们联系。

后在担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工作的马绍常等积极联络下，邀请与马麟有交往、与张掖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的马德涵与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张文彬和马宪民前往甘肃。

2月底，马德涵、张文彬和马宪民三人坐飞机到达兰州，次日即去凉州(今甘肃武威)，由马德涵携礼品先去会见马步青。因他们有师生之谊，所以见面后招待甚为殷勤。当马德涵婉转说明此行目的时，马步青颇感诧异，经喻以和平团结抗日救国的大义后，马步青答应可以帮助解决。

翌日晨，马德涵便引见张文彬和马宪民会见了马步青。见面后，他们向马步青谈到了西安事变的形势和国内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马步青听后为之动容，并且答应如数逐步释放红军。

于是，他们向马步青当面要求携两份介绍信，一份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一份由马宪民带去张掖去见张掖驻军韩启功(国民党军骑兵第五师副师长)，马步青当即答应办理。

马宪民由武威乘车去张掖会见了韩启功。韩启功见是上峰介绍，对马宪民颇为客气。他告诉马宪民：“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解除武装。对指战员都未加伤害，不久前已运青海去了。”马宪民在张掖住了一周后，又返回武威，与马德涵一起回到兰州，逗留两日后，便返回西安。

又过了三日，张文彬也回到西安，他们三人把此行情况写成材料，交张文彬向周恩来作汇报。后来，张文彬告诉他们，周恩来对这次远途跋涉表示感谢，这次西行对营救红军工作起到一定作用，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后来，吴鸿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想去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马德涵便再次把吴鸿宾推荐给马麟，希望能在西宁给吴鸿宾找个事做，马麟随即吩咐谭克敏给马步芳写信，推荐了吴鸿宾。

吴鸿宾带着马麟的信，去西宁与马绍常取得了联系，见了马步芳，进一步了解了西路军被俘将士的情况，并不时地把暗中获得的信件告诉马德涵，同时由马德涵转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到兰州后，吴鸿宾还向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谢觉哉作了汇报。

关于这段往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主委甘霖盟吴鸿宾在《陇原星火》上写到：“这是四十多年前事，每当我回忆这段不寻常经历，周副主席、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革命气魄，以及关心爱护革命同志的精神，使我永远难以忘怀，他们高大的形象仿佛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四处奔波为统战呕心沥血

1938年2月，马绍常被组织派到武威马步青骑五军做统战工作，后又改派到骑二师马禄部队中。1939年，他从驻在陕西三原的马禄部队调到西工委工作。不久，再度奉命到马步芳骑五军做地下工作。

1940年8月，马绍常到延安，11月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2月以八路军向导兵团高级参谋身份，派驻宁夏马鸿逵部任代表，争取马鸿逵抗日。1941年春季，马绍常返回延安。几年间，先后在延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和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1943年，他奉命到青海做地下工作，在临夏定时被捕，备受拷打致身体严重瘫痪；1944年脱险，奉命在邓宝珊司令部工作，后来又派到宁夏做马鸿逵部属的统战工作；1946年，被马鸿逵扣押，至1948年返回延安。

这段经历，甘肃籍爱国民主人士，曾积极参与促进宁夏和平解放的马廷秀先生(时任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在《百年见闻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在银川街头，一天，我碰见了马绍常，马绍常是甘肃广河人，回族，原任国民党环县县长。环县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做联络工作，他的父亲与马鸿逵熟悉，可能是这个原因便被派来宁夏工作。我与马绍常早年相识，他说他是习仲勋、贺龙派来的，直接与马鸿逵联系。我问他吃住在哪里，他说在警察局吃，在一个收容壮丁的大厅住。我认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应该这样对待人家。向苏连元打听，苏说怀疑马绍常的介绍信是假的。我便到档案室查看马绍常的介绍信，那上面有习仲勋、贺龙的木刻印章，字体一样。内容直截了当，没有当时一般信件上的客套话，仅仅提出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也没有介绍马绍常的身份。而且信纸十分粗糙，因此对这封介绍信甚为怀疑。既不敢让马绍常回去，又不敢公开接待，所以没有予以重视。但我总觉得这样对待使者不大合适，就找马鸿逵说：‘共产党的代表，生活上要照顾呢。’得到马的首肯后，我又两次对警察局长刘文耀(刘慕侠之弟)传达马鸿逵的意旨，才把马绍常安排在一个商号里吃住。我又建议每月发给马绍常生活费20元，经马鸿逵批准后，由秘书处出据代领，交给马绍常。马绍常送给我两本书，一是《论联合政府》，一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看了这两本书以后，感到共产党确有伟大之处，按照共产党的办法，中国能得到彻底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马绍常随二边地委进入宁夏。1950年，曾任宁夏交际处处长、同心县县长等职；1952年，调甘肃省委任社联会委员；1953年，组织上对马绍常1946年至1947年在宁夏被马鸿逵扣押一段历史做了“脱党”的定论。自此以后，他一直以党外人士身份被安排在甘肃省民委工作。

十年动乱时期，马绍常遭受迫害致死。1979年4月，甘肃省委作出为马绍常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指出“马绍常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做了一定工作”。

马绍常是甘肃回族中较早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他的革命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回族群众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马绍常：为党奔波终不悔

本报记者 马廉朴